

阅读的人生“枝繁叶茂”

□陈利娟

一岁多的时候，哥扯着我在路上走，为了躲避后面冲来的架子车，我倒在了村西北的地头上，双腿被车轮碾过，我妈一声惊呼，带起了一层黄土。架子车是堂姐起头玩的，她抱着表妹坐在车上，车由村东头几个年龄与她相仿的孩子拉着。我被车压后，我妈哭着去找几个小孩的大人算账，“恁家小孩压住俺家利娟了，差点给俺压毁”。

几家大人都在说暖心的话安慰我妈，只有找到坐架子车的堂姐家时，大娘不以为然的说了一句：“反正又没压死恁家利娟。”

这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在外被真正提起，既不是发展（我爸名字）的闺女，也不是瓜（我爷的名字）的孙女。在那个年代，我妈替我主持公道时，我犹如一个气球，在村东头滚来滚去。

这份不被重视，延续到了我初中辍学后打工的日子里。不论是普通话还是安徽、河南两地的方言，都可能把我名字里的娟字念成jue，读三声。如果对方对我不耐烦，这个读音还会被拉长腔。

在平湖服装厂当学徒时，我的名字总是被叫得“很垮”。“陈利jue，依这样笨的啦，画线也画不好。”自尊心如果有弧度，那一定是声音抛上班组的上空，再落到我耳朵的传播度。这时的气氛卑微又难熬。

平湖的日子只是学徒的煎熬，我真正的女工生涯是在江苏常州开启的。也是在那里，我开始认清“我是谁”。打工会让人“上瘾”，因为工厂遵守一套做工规则，以事论事。不似老家那般，一言一行都代表家族，背后是一门宗亲，是父母兄妹。进厂第一件事情，就是一个熟练工一股脑地把做法告诉你，每个人都不敢发出疑问。有一次，我实在忍不住问了一句，这个针脚为什么要这样压口，他不可思议地笑了，“都是这样做的，谁知道因为啥？”

在服装厂，我心里总是堵得慌。于是，我下载了一个听书软件，开始听书。听书的时间都是“赚”来的，一边在轰鸣的车间踩着缝纫机，一边塞着耳机听国内外名著、仙侠小说、名人轶事。记不清是听了200多本还是300多本，我把所有我喜欢的听书板块都听完了，3年时间过去了。有了输入就想输出，我学会在天涯社区发帖子，每次断断续续写几千个字，字数加在一起近10万，这让我有了一定的写作自信。

在一个寻常的夜晚，我同住在一屋的女工说，“我以后要成为一个作家”。当时大家想都没想就说，“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我没办法告诉她们我是谁，我有名有姓，在村庄生活了十几年，答案已经写在我的口舌里、我的饮食习惯里。对困境的无力，对自己的心疼，让我大哭了一场。一个工厂里，像我这样的女生有几十个，如果单凭对针脚的领悟能力，我算最差的那个，身上实在没有让人同情的点。

2016年来到宁波后，我的处境渐渐好了起来。21岁的我第一次看清楚了自己的相貌：薄薄的单眼皮，挺拔的鼻梁，有点瘦削的圆脸，组成了一张清秀的脸庞。再配上1米63的身高，95斤的体重，身形轻盈，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、抬不起头的打工妹。

2017年，我注册了微信公众号，我有好多话想要说出来，但语言仍是单薄的，只能以诗词形式，断断续续写一些感受。每次文章发布后散发的微光，就如同踩缝纫机时听书那般，让我坚信，只要坚持，满天星辰同样会照耀我人生的道路。

后来，丈夫公司所属的灵峰工业社区书



陈利娟发起的读书会活动现场



记史孟艳，通过丈夫在朋友圈转发的文章，发现了我的爱好，便推荐我加入大碇街道作家协会，也给了我参与宁波市级征文比赛的机会。沉淀了4年，我终于在2020年获得了第一个征文比赛奖项——宁波市总工会征文比赛三等奖。市级征文比赛获奖后，时任宁波市总工会宣教部长的王志勇，同时也是我文学道路上的贵人，把我的文章《醒来在人间》投稿给《浙江工人日报》，让我第一次有机会在纸媒上发表文章。

时间来到2023年，于我而言是收获满满的一年。我业余组建起40余人的读书团队，获宁波市总工会首批实习职工推广员团队赠书，大家养成了午休20分钟阅读的习惯，并坚持至今。同年4月，我受市总工会推荐参与浙江省阅读主题展演，朗读《阅读的力量》。9月，文章《繁花开尽寻常家》获全国总工会“网聚职工正能量”最佳评论奖。12月，征文获宁波市女职工征文一等奖，被一路选送，获评全国总工会“玫瑰书香”阅读学习成才女职工。

一个初中辍学的打工女性，凭借阅读与城市给予的文化滋养收获诸多荣誉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。阅读改变了我的人生，它一定能改变更多人。于是在2023年9月，我发起了一个读书会，以每周一期线下读书的频次，带领身边职工一起阅读。

做读书会没有方式可借鉴，我一开始就遇到了“想象很美好，现实很骨感”的滑铁卢。职工群体是害羞的，怕未知、怕成长，怕在公共场合说话。怎么办？我就“一个一个聊”：最开始没人来，我就“笨办法”上阵——翻微信、找同事，公司休息区见人就聊。一天线上线下聊60多个人，平均两天才能说动一个。第一场活动硬是这么“磨”来了20个

人。之后的两年半，参与人群从公司辐射至社区，再到北仑区、宁波市，每一期的观众都是这么聊来的。

要让大家一直来，就得知道职工真正要什么。我们职工缺“见世面”，需要“有用”的知识，所以我把读书会的课程分为四类：鼓励职工上台讲身边故事；链接宁波各部门资源，请各行业嘉宾带我们看更大的世界；邀请不同风格的作家聊书，挖透文字的力量；每月共读一本书，碰撞思考、书写感悟、提升表达。

办读书会3年来，让我骄傲的不是办了多少期，而是读友身上发生的改变：有人跟着嘉宾学会教育孩子，亲子关系融洽了；有人从不敢说话到能上台侃侃而谈；更有5位职工，从写不出完整感言到通过写作课程加入区级作协，看到了工作之外的另一种可能。读友中很多人都是租着小民房，一个房间要做饭、睡觉、洗漱，心里藏着何种孤独和自卑，但在读书会里，他们不再是“被料头的师傅”“没学历的小陈”，而是能表达、有思想、活生生的“人”——他们在这儿享受城市的文化福利，更找回了向上的底气。

2025年，我开始重新拾起梦想，想出版一本书。面对这个梦想，只有两万字的草稿显然应付不了。我想把自己摊开给大家看，但又放不下好不容易维持的面子。一番斗争之后，梦想压过了现实。我开始补充自己人生的前三分之一：一个农村女孩辍学离乡，做过缝纫工、当过保安、摆过摊、开过驿站，最后在宁波站稳脚跟，成了一名生产车间文员，办起了职工读书会。

在写书的过程中，我不断剖析自己，最后写了40多篇文章，12万字，哭了10多次，

而且哭的次数还在增加，因为每被采访一次，我就会被曾经遇到的磨难扎到，纵使我心里已经释怀，但还是免不了它们再次在我身体里碎成渣渣、遍布全身。

创作过程中，我好几次对编辑表达了不自信，整个人变得紧绷起来——担心文笔稚嫩，上不得台面；担心评论家说我的作品一无是处；担心读者不认可，顺便讨伐我。从前我写作，只为表达自己的内心，不问回响。可踏上创作出书这条路后，我开始在意外界的声音。这导致有段时间，一两个月写不出一篇文章。

好在2026年4月，在一场新大众文艺活动中遇到宁波出版社社长袁志坚，他和我聊天后，很肯定我的表达能力，让我不必追求我认为是文学性表达，只管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看到的事情。一位优秀的评论家确实能给写作者带来莫大的鼓舞，听完他的肺腑之言后，我花了数月时间，又创作了10篇文章，把原先不太满意的稿子替换下来。这下我的书稿终于有了一些样子，一直埋藏着的情绪也被抚平不少。

摊开自己，是我写《走向枝繁叶茂的人生》这本书的初衷。在创作过程中，我也与自己达成了和解。我跨越心理障碍，把产业工人这个群体的处境写出来，让社会都看到我们的心声。我们的生存处境，我们想要的善意，以及我们也可以通过持续的学习，走向枝繁叶茂的人生。希望时代可以带带我们、等等我们，等一下我们这群在时代洪流里颠沛流离的人。

我们振臂高呼，也想要站在时代的船上，无非是比旁人慢一些，但只要风，一样可以扬帆起航。

（作者系宁波力劲科技有限公司职工）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的月工资不足百元，上有老下有，日子得精打细算。丈夫一直订阅《无线电》《电子世界》，儿子订阅《科技报》《电脑报》，我放弃订阅文学报刊，一有空闲，便洗净双手，跑进三联书店蹭书读。

每次去，都会看到书店楼梯的台阶上，坐满看书的人。他们静静地翻着书页，再决定要不要买下手里的书。这一幕让我心生敬意，也踏实了许多，原来在书店也可以只看不买。不同的是，我看书不选择台阶，就在感兴趣的书架附近，一声不响地蹲在某个角落认真捧读。看着看着，便忘记身在何处，完全融进书里，跟着作者走进另一个世界，一同体会欢喜、难过、愤懑与安宁。那是精神上的享受，是灵魂上的起舞。

“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。”一年四季，都有诱人的景致。可我依旧一次次走进三联书店，这里有满架的中外名著、各类好书与文学刊物，是一道又一道更吸引我的风景，看不尽，也赏不够。

那个时候，有朋友向我推荐周大新的作品。盼到周日，我在三联书店密密麻麻的书架上仔细搜寻，看见他名字的那一刻，心里一阵欢喜。那天，我着重选读了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：《汉家女》《小诊所》《向上的台阶》《银饰》等。我蹲在书架僻静的角落，目光落在书页上，再也移不开，越看越喜欢。就这样一读就是好几个钟头。起身的时候，双腿麻木，半天挪不动脚步。缓过来之后，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书店。天色已经暗下来，半个月亮挂在天空，街灯和月光一起照亮我回家的路。这时我才感到饥肠辘辘，竟然忘记吃午饭，赶紧骑上自行车往家赶。

那几年，我常去书店看书，却很少买书。尽管书店工作人员不说什么，我心里总有些过意不去。1995年，我的月工资涨到400多元，手头宽裕起来，终于舍得买书了。翻看书柜里的书，像《平凡的世界》《香魂女》《毕淑敏作品精选》等一批书，都是那年从三联书店、作家书店、青年作家书店陆续买回来的。

有一回，西安的一位老朋友来京办事，住在我家里。我们曾经在某军工厂共事多年。这位朋友姓贾，是位大夫，医术精湛，待人和蔼，曾任我们单位职工医院的院长。后来，我们一家调回北京，他们全家调往西安。阔别数年重逢，彼此有说不完的话。我们都热爱文学，聊起陕西几位作家的作品：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、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等，我们俩都读过，十分喜欢。贾大夫谈起路遥的《早晨从中午开始》，说读后深受触动，建议我读读。朋友走后，我四处借阅这本书，借不到，又到处去买，依旧无果，心里很是着急，越得不到越想读。贾大夫得知后，特意在西安帮我复印了一份寄来。捧着沉甸甸的复印稿，我不由得落下泪来。

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高，家中购买的书籍也越来越多。中国的四大名著、众多外国经典，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，还有不少相识作家的佳作，一本本从书店买回家，整整齐齐立在书柜中。坐在沙发上，随便抽出一册翻看，都是莫大的享受。

退休之后，阅读与写作成了我生活的重要部分。北京胡同里的变迁，大杂院里的人与故事，都化作我笔下的素材。我出版的几本书，写的大都是身边的人和事。三联书店给了我精神滋养，老北京胡同文化浸润着我，邻里之间淳朴的善意打动着，我一本本书籍慢慢哺育我成长。阅读教我谦逊、勤勉，待人真诚，心存善意。在这种力量的鼓舞下，我曾经获评“北京好母亲”等，我家先后获评“首都五好文明家庭”“首都书香家庭”“全国书香之家”。我明白这些荣誉意在鼓励，自己还差得很远。

我向来敬佩自己所热爱领域里的出色之人。我爱文学，自然对写出好作品的作家满怀羡慕和敬佩。若是听闻哪位相熟作家出版了新作，我总想先睹为快，希望能向他们求教。

我清楚自己有不少短板：不认路、记不住人脸、读书积累有限，也不擅人情世故等。记得20多年前，为求得作家指点，我突发奇想：丈夫工作之余经常义务帮人修理家电，儿子拿过全国青少年计算机奥林匹克竞赛一等奖，常帮人解决电脑疑难问题。我让他们父子二人上门，帮我敬重的作家解决家电维修，以此换取作家对我写作与阅读的具体指点。几位作家曾给予我一致答复：多读书，多读中外名著。

现在，书柜和家中的各个角落，新书越堆越多。周边的书店、图书馆也给阅读带来极大便利。好书浩如烟海，穷尽一生，恐怕都读不到万分之一。我读书速度很慢，如同蜗牛。既然快不起来，就慢慢读。老话说：不怕慢，就怕站。只要不停下，总会有所收获。

站在书柜前，偶尔抽出一本旧书翻看，如果不是看到书页上画了许多波浪线，我常常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读过它。即便后来在书未记下购买和阅读时间，不少内容依旧慢慢淡忘。就连当年在三联书店读到的篇章，很多细节也已经模糊。但我始终相信，读过的书不会白读。它们一定会悄悄留下印记，滋养我人生的各个阶段。每每想起当年蹲着看书的情景，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意，合上书的那一刻，内心的充实与欢喜，到现在依旧清晰记得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短 评

作家田苹的长篇小说《斩缚者》以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肃特行动为叙事起点，通过双线时空对照的叙事结构，将反特悬疑与历史纪实巧妙融合。作品不仅在艺术手法上展现出独特的地域色彩与叙事张力，更在主题上深入探讨了“斩缚”的双重内涵。

《斩缚者》的书名构成了全书的核心隐喻。“斩缚”的主旨有两层：一层是斩断国民党特务施加在革命者与普通民众身上的暴力枷锁；另一层是消解历史冤案、过往罪孽、内心执念编织的精神桎梏。这种主题的设置，使得作品超越了单纯的刑侦悬疑，上升到了精神救赎的高度。书中，苏秀兰了结丧夫之痛与战友蒙冤的心结，严坤解开同窗愧疚，徐春阳放下缠绕半生的心理枷锁，这些人物的命运走向共同指向了释然与新生。

作品通过还原地下党员遭受残酷迫害的悲壮史实，以及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挣扎与觉醒，深

把人性的光亮书写为灿烂的存在

——评长篇小说《斩缚者》

□刘川鄂

刻揭示了历史创伤的愈合过程，勾勒了两代人接续守护家国的精神脉络。例如，徐春阳最终被捕、面对前来探望的妹妹草儿，他内心对草儿的牵挂与对自己命运的无奈交织，体现了他试图斩断过往罪孽、寻求精神解脱的复杂心境。

人物塑造方面，《斩缚者》摒弃了一些传统红色题材作品中非黑即白的脸谱化倾向，深入挖掘人性的复杂肌理。徐春阳是一个典型的“乱世灰色小人物”，既是曾沾染革命志士鲜血的特务爪牙，又是抚养烈士遗孤、自我救赎的慈父。这种善恶交织、进退两难的特质，构成了这个人物的形象内核。作品通过大量的心理描摹，展现他在罪孽与救赎间的长久撕扯，有很实在的现实深度。

作品对革命者许光杰、孙小菁的塑造也去除了“神性”的光环，还原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情感与牺牲。当然，二元对立的固定思维模式，在作品中尤其在男女英雄的表白中处处可见。此外，反派周裕安被刻画为阴狠狡诈的元凶，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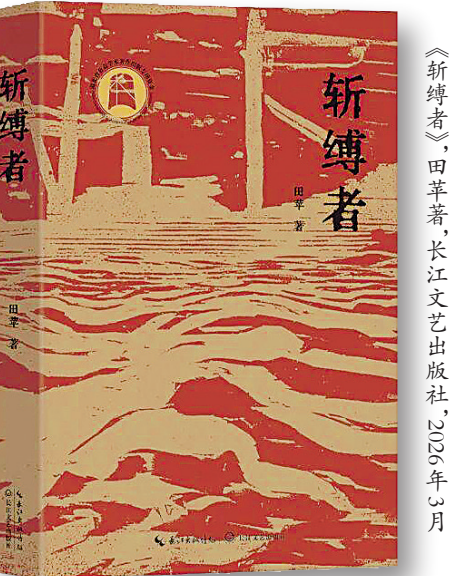
精通草药、策划炸死的细节，使其恶的形象更加具体可感。姚娘娘、彭国富等平民配角的加入，不仅丰富了人物群像，更赋予了作品浓郁的乡土纪实质感。

《斩缚者》以1951年当代追凶为叙事主线，以1938至1941年地下惨案为回忆副线，形成了一种严密的逻辑闭环。渡轮纵火案作为“头”，引出对元凶周裕安的追捕；历史冤案的还原作为“身”与“尾”，则在追捕过程中层层剥茧，最终实现了“今日追凶，亦是昔年沉冤昭雪”的叙事目标。

作品构建了江城、施南城、林阳老街三重空间叙事体系，不同地域承载着不同的历史记忆与人物命运。在叙事视角上，作品融合公安办案的客观视角、徐春阳的内心独白视角以及周裕安的审讯供述视角。这种多视角的交叉印证，打破了单一视角的局限性，使得历史真相在执法者、加害者与罪魁祸首的不同维度下得以立体呈现，极

大地增强了文本的真实感与厚重感。

《斩缚者》的语言艺术也是其最鲜明的标识之一。田苹作为土家族作家，将浓郁的鄂西地域风情与精炼的文学语言巧妙融合，构建了一套独特的“地域诗学”。首先，作品使用鄂西及川渝一带山区的方言词，如“嘎儿”（肉）、“背时”（倒霉）、“哦哟咕”（出事、离世）、“扯白”（闲谈）等，按实际需要进入叙述或对话，对文本的地方感、生活态有极大助益。其次，作品的行文语气按叙事时空的不同而有所变化。对于1951年左右的现代刑侦内容，语言简练、冷静，接近纪实风格，以符合当时公安调查所用的思路及紧张状态；回忆抗战、写到林阳老街的日常光景时，笔法又多低缓凝重或柔润轻快。最后，作品在抒情上极为克制，多用白描手法勾勒景物与人物情绪。无论是江面的浓雾、古城的月洞门，还是人物细微的动作，作者都惜墨如金，通过画面感极强的短句来传递情感，留白充足，余味绵长，成功将鄂西的山水风



物与人物命运编织成一幅充满诗意的文学画卷。就史料而言，《斩缚者》是党史研究的可资利用之物，就文学本身，它又以细腻笔法写人、以诗心描绘地方文化，所写家国大事和个体命运并不割裂，既是对历史记忆的温柔回顾，也把人性的光亮书写为灿烂的存在。

（作者系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）